

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、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评析，此举迈出了第一步，但是重要的一步，意义不亚于冷战时美苏大国战略协调核武器。

多重战略意义

中美围绕人工智能开展政府间沟通并非首次。单以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来看，今年5月，特朗普访华期间，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，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。4个月后的华盛顿会晤则将这种“原则性意向”升级为“常态化、机制化的突发事件沟通渠道”，无疑是一次重要突破。

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逸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称，人工智能治理，正在从科技竞争议题进入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相关的议程之中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个议程也因此成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最最新，最前沿，也最有可能取得功能性突破和进展的议题。

“双方对全球AI治理的理念存在差异。美国部分政策力量仍然习惯从技术领先和地缘竞争理解，中国则强调公平、包容以及技术发展成果的普遍受益，反对把AI变成地缘政治博弈和技术垄断的工具。人工智能正在成

为中美竞争最前沿的领域之一，同时也正在制造双方共同面对的新风险。”

沈逸说，2024年中美元首会晤期间，双方确认有必要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，并共同确认“有必要保持人类对使用核武器决定的控制”。近年来中美官方交流中，也已经涉及军事AI、人类控制、网络风险和危机沟通等问题。这次达成的共识，就是把原则进一步变成可以执行的风险管理机制进程中，必要的一步。

“当前中美关系需要增加确定性。所谓战略稳定，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竞争，也不意味着分歧会迅速消失。更现实的含义，是双方能够知道哪些事情不能做，哪些风险必须管住，出现意外以后如何沟通，以及怎样防止一个局部技术故障演变成无法控制的战略事件。因此，可以对中美之间即将就AI治理展开的对话与沟通，保持谨慎乃至积极的乐观。”沈逸认为，如果双方，尤其是美方，能够真正贯彻落实元首峰会共识，从AI安全和战略稳定入手，围绕人类控制、危机沟通和高风险应用形成一些具体、可核验、能够逐步推进的安排，其意义将远超预期。中美需要竞争规则，也需要风险护栏。让人工智能成为能够管理竞争、增加确定性的新合作领域，可能正是当前中美关系最值得认真探索的现实选择。

博弈中前行

如今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益进步，人类讨论的话题已经从“我们能用AI做什么”转向“AI应当被允许做什么”。

而回顾历史不难发现，近代以来，人类每一项颠覆性技术的诞生，都逃不开“发展红利与生存风险并存”的激烈讨论。核技术如此，如今的人工智能也是如此。

中美两国作为全球AI领域体量最大、创新最活跃、应用最广泛的两大经济体，此番华盛顿会晤达成的AI共识，后续将如何从原则性、框架性的顶层设计进一步落地呢？

从各方表态看，外界对下一轮对话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。一是事件如何界定。美国一系列主流媒体注意到，成果文件没有说明何种事件需要通报、双方将交换何种信息。二是议程范围如何确定。有报道称，此前双方在议程设置上存在差异：美方希望聚焦人工智能安全与技术风险，中方希望讨论更广泛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问题。三是企业如何参与。四是对话与竞争如何并行。此次人工智能成果没有触及先进芯片、算力准入和出口管制等争议，而这些问题仍是美国国内政治讨论的重要部